

第六章

學術成就



五四健將羅家倫傳



綜觀羅家倫一生，他在北大求學時，因參加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而成名；留學美國和歐洲時，既致力於在學術上開闊眼界，也努力想為自己確定一個學術方向；回國後，他一度到大學教書，確定以近代史研究為自己的學術方向，但不久，他即因北伐加入到國民黨的黨政工作中去，自己的學術志業就此中斷；北伐之後他多從事文教方面的工作，一度出掌清華大學，在中央大學更歷經十載，但大學校長之職與專業學者的研究終究有別，更因為身處兵荒馬亂之歲月，大學事務亦繁雜異常，羅氏此間實無專門精力致力學術；離開大學後他更「專業」從政，一直到國民黨退守臺灣，他出任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以及國史館館長，似乎才又重新回到史學界。

和他昔日在北大的同學傅斯年、顧頡剛這些人相比，他並未成為特別有建樹的學者，而是一個以「事功」見長者。羅氏在青年時代，即有多方面的以，遊學歐美時更廣為涉獵，但其為學方式「博而不專」，這對其後來做文化官僚頗為適宜，但終未成就於學術。唯羅家倫對於近代史的重視，他一度有過的思考，是在建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關鍵時期，因此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而除了史學，羅氏最大的愛好乃是文學，其最為人知者，是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但更應該說，文學是羅氏具備的一種良好修養，終其一生，吟詩作文是其記敘生命、抒發情感最重要的方式，而演講是他感發和教育他人最重要的方式。他在文史方面的成就雖不及他的事功，但透過這些觀念、思想、感情的吐露，他這個人才能更完整、更豐滿地向世人呈現。

文學業績

羅家倫就讀北大，正是他的師長陳獨秀、胡適等人開展新文化運動之時。羅氏雖為學生，但得

此風氣，亦為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之一。他與傅斯年創辦《新潮》，乃公認受胡適影響極深，努力推進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陣地。羅氏在新文化運動中，以文學理論和翻譯見長。在他為《新潮》所寫的文章中，鼓吹新文學運動的，有《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什麼是文學》、《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等文。這些文章都是對新文學的申述、辯護，對敵對陣營的批評、駁斥，多支持和維護胡適等人的觀念（詳見第二章）。

羅氏在新文化運動中，除了鼓吹文學革命的理论文章，他還對西洋文學的翻譯產生了興趣。

一九一八年，胡適編輯「易卜生專輯」，其中《娜拉》一劇，即是羅家倫和胡適合譯，羅氏譯第一、二幕，胡適完成第三幕。此後，羅氏對西洋詩歌和戲劇的興趣，持續了十餘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十月，羅家倫翻譯的《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出版。共收錄有梅斯斐德（John Maschfeld）的《臨別》（The Sweeps of NinetyEight）、梅德敦（George Middleton）的《潮流》（Tides）、葛賴戈雷夫人（Lady Gregory）的《月起》（The Rising of the Moon）、高士華胥（John Galsworthy）的《陽光》（The Sun）、段香萊爵士（Lord Dunsany）的《詩運》（Fame and the Poet）、巴克斯特（Winthrop Parkhurst）的《奇丐》（The Beggar and the King）、狄鏗生（Thoms H. Dickinson）的《割症》（The Hospital）、何騰（Stanley Houghton）的《巧遇》（Fancy Free）、白納德（Arnold Bennett）的《性別》（A Question of Sex）、瓊斯（Henry Arthur Jones）的《遺志》（The Goal）等十篇獨幕劇劇本。羅家倫自謂該譯作從他一九二二年在美國時就開始作。「每逢厭倦了哲學的玄想和吸夠了史料架上的灰塵以後，便藉看獨幕劇為精神上的遁逃藪，因此譯者對於獨幕劇的文藝，發生了很親切的興趣。」

十年以來，無論在留歐或回國期間，也是有暇便以看獨幕劇本為娛樂，所以至少看了五百篇以上。選擇好的，隨手翻譯。有時候一年翻成一篇兩篇，有時候整年的一篇不翻。逝水的光明，過了十年，積下了十篇的譯稿，恰好平均起來是一年一篇。到現在才把他們集合起來，印成一冊。」¹

在第二章已特別提到在五四集會和隨後的遊行示威中，由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頗能體現羅氏為文的一種風格。一九三六年冬天，羅家倫代表中央大學師生到綏遠看望抗日將士時寫的一篇《告綏遠將士書》。文章雖不長，但既激揚悲壯又樸實厚重。今天讀來，回想那艱難困苦抗戰歲月，仍覺得其間蘊含的浩然之氣蕩蕩長存：

綏遠前線各軍武裝同志：

經我們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為我們所有，民族的生存和榮譽，只有靠自己民族的頭顱和鮮血才可保持。這次我看見各位將士塞上的生活，已認識了我們民族復興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黃沙的堡壘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認識我們中華男兒還是獅子，並非綿羊。我們全國同胞的熱血，都願意奔放到塞外的戰壕裡，助各位消滅寒威，激蕩忠憤。我現在籌俸國幣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殺敵前一醉，但是想起這是長期鬥爭，並非一次的慷慨赴難，所以願將這些小的款項，改為醫藥衛生設備之用，備各位壯士裹傷再戰。現在整個民族的命運，抓在我們手裡，我們大家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只有我們血染過的山河，更值得我們和後世謳歌和愛護。我誠懇熱烈地向各位

1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一〇五頁。

致敬，更願代表國立中央大學三千教職員和學生，向各位致敬。

羅家倫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綏遠

羅家倫擅長演講，在他生命的各個階段，他都有不少富有感染力，使聽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講。五四運動中的演講，就任清華校長的演講，在政治學校對學生的演講，抗戰期間對學生、對官員、對民眾、對抗日將士的演講等等。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的《文化教育與青年》乃羅氏關於文化教育方面的文章選集，其中就有部分是他任清華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和中央大學時的演講，除了對當時的聽眾，這些演講對一般知識分子和青年都富有啟迪意義。而羅氏眾多演講中最著名的，乃他在中央大學時對全校師生所作的系列演講。當他接掌中大之初，即提出「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作為中大的使命。尤其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國家生死存亡之時，他以普法戰爭後的德國柏林大學為例，說明大學對國家所產生的影響，所應擔負的責任和使命。而柏林大學哲學教授費希特以自己的在危城之中激情不墮的一系列演講，對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復興產生巨大影響。羅氏以費希特為自己的榜樣，在抗日戰爭當中，對中央大學全校師生做了一系列演講，後經修訂集《新人生觀》一書。羅氏在此書自序中說：「我斷不敢希冀前哲在圍城中講學的高風，但是這十六講卻章章都是講完和寫完在敵機威脅的期間，有時還在四周圍火光熊熊之中。我斷不敢說這部書是表現一種有力的思想，我只敢說這是我個人用過力氣去思想的一點結果。我是根據自己知道的深信以充分的熱忱

1 轉引自謝冰：《羅家倫的激情與文采》，《南方都市報》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三日。

寫出來的，自然我也希望國人能得到同樣的深信。」¹羅氏豐富的學識、豪壯的襟懷、洋溢的激情在演講這種形式中得到了最好的發揮。

許多人回憶羅家倫時，會說到他對工作熱忱積極、勇於任事，有時候熱情過甚還招人諷刺。其實這恰恰因為就羅氏本色而言，終其一生，未脫其詩人氣質。正如羅久芳所言：「父親雖然一生從事教育、政治、外交及學術的工作，但是他豪放熱情的詩人氣質，從未被埋沒，對藝術、音樂的愛好，也從未間斷，他在大學和留學期間，對西洋詩發生了很強烈的興趣。在西詩的翻譯和文化新詩的創作方面，曾作過一番嘗試，抗日初期悲壯的史實，更激起了他在新詩和歌詞方面的創作，充分地反映出他悲憤的胸懷和堅強的民族意識。後來他選稿印成的一本《疾風》，是他代表他那個時代『心靈的紀錄』的新詩集。」²

更有趣的是，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文學革命的鼓吹者，其白話新詩的數量和質量恐怕都不及他的舊體詩。羅久芳說：「父親對舊詩的喜好和這方面的根基，從小便受我祖父的影響，創作量也較新詩為多。他愛在舊形式中創造新格調，來表達新的意識和感情。」³羅家倫一生保持著寫作舊體詩的習慣，尤其喜作絕句。沈剛伯在回憶羅家倫時，特別說到羅家倫身上種種矛盾性格的自然調和，其中之一便是這種新舊文化的自然並存：「他一向唾棄文言文，而偏愛做舊詩，其絕句佳者

1 羅家倫：《新人生觀·自序》，《文存》第十冊，序跋，第二三〇頁。

2 羅久芳：《追念我的父親》，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3 羅久芳：《追念我的父親》，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幾可與龔定庵相頡頏。」¹一九五七年，羅家倫曾把他六十歲以前的詩作，花了一年多時間選定、加注、用毛筆字手抄，影印線裝為《心影遊蹤錄》，內分《耕罷集》、《滇黔寄興集》、《蓼莪集》、《玉門出塞集》、《海色河聲集》、《轉緣回黃集》、《天竺紀遊集》、《海天俯仰集》。他在自序中云：「憶前二十五年國難突起，時艱蒿目，孤憤塞胸，間作短詩，藉抒抑鬱，精神上張弛之調協，文學中之妙諦存焉。余常以絕句遣興者，以其拘束較少，不必作使事與對仗工夫，而音節復近自然，較易成誦。……藐躬生於憂患，不遑寧處，詎辭冒犯，迭味炎涼；然萬方多難，未廢登臨，索險尋幽，彌增興感。雄奇之雪峰雪嶺，浩渺之滄海流沙，舉凡雲端一羽之痕，沙上明駝之跡，前人索無緣兼收者，余幸得而並蓄，惟此情此景，亦常偕憂患以俱來，此余紀遊之詩獨多也。」²正如詩集之名所示，從詩歌中，可以看到他大半生遊蹤所至以及在心中留下的印跡。不過，羅氏亦在《心影遊蹤集·序言》中謙稱：「雖然持鋼筆作白話詩文如余者，曷足以言舊詩，此不過余之野狐禪而已。」並解釋說：「余無意僭居雅壇之一席地，尤冀賢達毋因此而置悟於極待拓展之新詩無量前途。」³一九五三年他為紀念胡適六十二歲生日寫了一首白話詩。據羅氏之女久芳說，此時的羅家倫早已不常寫白話詩，贈送個人的白話詩更是絕無僅有。這首詩裡面，羅家倫寫有兩句：「請你不要罵我用古文的濫調，真是：和而不同強哉矯。」羅家倫一向是胡適文學革命的追隨者，羅家倫對胡適這個小小的解釋，殊為有趣。從羅家倫的舊體詩看，記事，則家事國事天下事；記遊，則四面八方海內

1 沈剛伯：《悼念羅志希先生》，臺灣，《中外雜誌》第七卷，第三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2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自序》，《文存》第九冊，詩歌。

3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自序》，《文存》第九冊，詩歌。

海外；抒情，從兒女情長到感時傷懷，內容包羅萬象，無所不至。他生活世界遭逢的一切，無不可以入詩。他習慣用來記述生命，抒發情感，自然而出，無拘無束的，居然是舊體詩。亦可知舊學在五、四一輩新人的生命中印痕至深。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弄潮兒之一，這實在是很有趣頗堪回味的。事情。舊學對五四一代新人潛移默化的滋養和影響，或許正是某種得天獨厚的，造就他們生命特質之底蘊。

但在羅家倫詩歌創作中，傳誦最廣的乃是歌詞一類的作品。羅久芳說道：「早在九一八以後，父親便公開提倡以高尚而大眾化的歌曲來振奮全國軍民的愛國情緒。他主張歌詞應作到易懂而上口，樂譜應富旋律而難忘。他一生所作的軍歌、校歌以及抗日、愛國和反共的歌詞，共有數十首，多由知名的作曲家製譜，並在各時期普遍地流行過。」¹《南京通志·文化編·文化事業卷（八）》中說：「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九·一八』及翌年『一·二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作了三首軍歌《出征》（一）（二）、《凱旋》，由唐學詠譜曲，中央大學音樂系合唱團首演，由南京中央廣播電臺錄音，歌聲傳播全國，激勵民心，鼓舞抗日士氣，發揮了極大功效。」²這些有高度抒情性並富有愛國激情的歌曲中最有名的是《玉門出塞》，曾由李惟寧、唐學詠兩位名家分別譜曲。羅久芳曾說：「相信千百年後每一個中國人唱了這首歌，仍不免要與父親對大西北的熱愛有所共鳴。」³

1 羅久芳：《追念我的父親》，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2 參見《南京通志·文化編·文化事業卷（八）》，見「文化發展網站」<http://www.ccmdu.com>。

3 羅久芳：《追念我的父親》，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左公柳拂玉門曉，
塞上春光好。
天山溶雪灌田疇，
大漠飛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
好似仙人島。
過瓜田碧玉叢丕，
望馬群白浪滔滔。
想乘槎張騫，
定遠班超。
漢唐先烈經營早！
當年是匈奴右臂，
將來是歐亞孔道。
經營趁早！
經營趁早！
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

這首歌詞後有跋，對創作時間和緣起有所交代：「此歌作於民國二十三年。自九一八後，國難



愈迫，悲憤難當，常譜笳聲，而勵士氣。同時復感西域危機，不讓東北，爰藉出塞之歌，以報天山之警。是時也，余不特未曾至新疆，即陝甘亦非吾履痕之所及。塞外風光，不過童年想像中之遺痕耳。」¹這首歌詞大氣磅礴、寄意深遠，再加上珠聯璧合的曲調，抗戰時期曾在大後方被廣為傳唱，成為激勵民族精神的一曲戰歌。

史學業績

早在羅家倫遊學歐美以及回國初期，他曾一度將自己一生的學術志業定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他曾說：「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這不是說遠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說近的切的更當研究，尤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須研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²羅氏對近代史的興趣，可以上溯到他在北大求學之時。一九一七年四月，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國史館「主持無人，形同虛設」，呈請大總統黎元洪下令停辦國史館，由教育部接收。同年六月，教育部商得北京大學同意，在北京大學內附設國史編纂處，由蔡元培兼任處長。羅家倫於一九一七年秋季考入北大，在北大期間他就參與了國史編纂處的工作，搜集辛亥革命時代的出版物。

1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自序》，《文存》第九冊，詩歌。

2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轉引自林志雄：《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思與言》第四十卷，第四期。

而羅氏注重近代史的意識，更和一個時代的大環境相關。晚清以降，由於封閉的中華帝國同西方交接受到的震蕩，國人開始意識到所身處的時代乃「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循的傳統歷史觀念、歷史解釋和書寫方式都受到強烈衝擊。尤其身當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而積貧積弱的祖國，新一代的知識精英們有著特別慘痛的體驗。對於歷史觀念、歷史解釋和書寫方式的關注，莫不與重新確立和建構「國族」地位這一目的有關。「直到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一方面憂忡國家的興衰存亡，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所影響，進而提出『史學革命』的口號，希望能擺脫傳統史學的桎梏。」¹梁啟超首創的「史學革命」，其實質乃是要從現在的立場出發對傳統進行重新認識。這一觀念為五四一代學人積極響應，成為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思想界一股潮流。胡適就為此雀躍不已，從而成為更積極的推動者。在社會進行觀念的推動下，近代史獲得了特別的重視。「與以往傳統史學不同，『近代史』作為一門全新的研究領域，是二十世紀的時空環境因素下所誕生的產物。這一新研究典範，不但有著現實需求，也蘊含歷史解釋在近代中國所呈現的意義。」²

一九二一年，適逢九國會議在華盛頓揭幕，羅家倫參與聯合留美學生維護國家主權的活動，日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人物蔣廷黻當時也是其中一員。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近代史研究觀念，頗得羅家倫支持。一九二二年羅氏也入哥大就讀，蔣、羅兩人常在一起論及中國史學及研究方法，蔣廷黻還向羅家倫借閱過《日知錄》、《明夷待訪錄》、《廿二史札記》之類史籍。蔣廷黻晚

1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2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年對郭廷以說：「最早賞識我，勸我做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羅志希。」看來，早年的這段交往，兩人在許多觀念上頗有共識。而羅家倫亦在蔣廷黻的激勵之下，開始注重近代中國史料。在美國經歷的外交事件以及同蔣廷黻的交往，似乎使羅氏在留學期間的志業發生了一個轉向，從留學之初學習西方歷史哲學的計劃轉向對中國歷史的構想。但無疑，注重近代史的觀念以及近代史學的解釋模式本就受到西方各種歷史哲學的影響，但對於蔣、羅等人來說，從自己的國族背景出發，又面臨著在這些西方歷史哲學中解釋中國近代歷史的尷尬局面，因此，近代中國史的確成為一個極具開創性和挑戰性的領域。而這種極具開創性和挑戰性的事業特別符合羅家倫的胃口。羅家倫在給張維楨的一封信中說：「我的野心是要將來公認我對中國這個時代的進步程序中，我是有堅實貢獻，有真正影響，少不了的一個人。不但對於中國學術有種貢獻，而且可以學術影響社會和民族的將來。所以，我選定這種近代史的工作。」¹在羅氏給張元濟的信中，他談到想寫一部中國通史的宏願，通史計劃是從一八二〇年左右開始，到一九一一年清朝覆亡為止，之所以如此斷代，「因此期為中國歷史變遷最大之期。……兩種文明接觸後，不但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民族生存問題所關），互相衝突，而且思想文化無一而不持戰。此等大變，亦世界史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問題。」²由這個宏願出發，羅氏還向張元濟提出了具體收集史料的計劃（見第三章）。

對於史料的重視，是民初史學的一大潮流，也是羅氏等人所倡「科學方法」的必要條件。「民

1 邵銘煌：《羅家倫的浪漫情懷——羅家倫寫給張維楨的情書選粹》，第一四六頁。轉引自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冊，注釋二十三。

2 轉引自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初史學講求科學化的特色之一，就是要廣泛地占有特殊、新奇的史料。」¹從五四時候開始，羅氏就在許多場合，針對不同的學科，不斷說及科學方法對於研究的重要。這一點，羅家倫、傅斯年他們這一批人乃在北大時期就深受胡適的影響。「從『史界革命』到『整理國故』，胡適的學術生涯始終圍繞著怎樣運用科學方法對傳統文化進行革新和創造。」²胡適畢生追求中國與西方文化在方法論上的溝通，即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以求證明文化改造在現代中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³可以說，胡適的這些觀念已經成為羅家倫等人的根本共識。在回憶傅斯年的文章中，羅家倫說到傅斯年留學時候專注自然科學的原因所在，頗能說明他們這一批人注重所謂「科學方法」的觀念：「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裡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⁴許多人都指出羅家倫秉持現代化觀念，王世杰曾說他是一「現代化主義最徹底的倡導者」，而對羅氏而言，科學化不啻為現代化的象徵。

羅氏留學歸來，一度專心於歷史學教職。昔日北大同學顧頡剛非常支持羅氏研究近代史的計劃，對於收集和整理史料以達成科學治史的這種規劃，顧、羅兩人一拍即合（詳見第四章）。羅氏此時懷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宏願，顧頡剛也對他深報期許。一九二六年九月，羅氏返南昌省親時遭遇兵亂，幾陷死境，顧氏在關切的信中嘗有「斯人如死，如中國近代史何」之嘆。然而，因為時局關係，

1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2 王晴佳：《中國二十世紀史學與西方——論現代歷史意識的發生》，臺灣，《新史學》第九卷，第一期。

3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八頁。

羅家倫這一系列計劃再次落空。

不過，羅氏在東南大學雖然只有一個學期多，得到羅家倫鼓勵和指導的郭廷以，以後致力於太平天國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對羅氏近代史研究的構想多所實踐，成就不凡。羅家倫在旅歐期間，對太平天國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太平天國史料的搜集，不遺餘力。據他說：「前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之間，有幾位朋友，在國外圖書館中，發現了許多太平天國的書籍和文告，或抄或影，帶回國來。如劉半農、俞大維、許地山諸先生都是做過這類工作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但是除半農因發現在最初而略有刊印外，其餘的人，都因為有心做一點考訂的工作，附帶發表，而不曾將這類抄影的文獻，刊行於世。其實這項抄影的工作，不過是為太平天國保存文獻而已，並不足以稱研究太平天國。」¹而羅氏當初的某些構想，後來由他的學生郭廷以實現了。王聿均說：「郭教授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受羅先生的鼓勵甚多，啟發極大。羅之才華橫溢，方面極廣；郭則篤實沉潛，以畢生之力專注於近代史之研究。日後二人過從極密，誼在師友之間。郭為東南大學畢業，民國十五年夏，羅氏返國時，始從之遊。十七年三月，北伐軍總司令部設立『戰地政務委員會』。羅氏任委員兼教育處主任，隨軍北伐，擔任前線政治工作。郭即在『教育處』任職，官階為上尉。此為二人共事之始。十七年八月，國府任命羅氏為清華大學校長，九月就職，郭隨往清華任『教員』；民國二十一年九月，羅氏接長中央大學，郭又隨往歷史系講師。開『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明清史』等課程。抗戰時期，中大內遷，校本部設於重慶沙坪壩。郭住於石門村（中大教職員宿

¹ 羅家倫與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所寫的序言。轉引自王聿均：《羅志希先生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〇五頁。

舍)一號，羅住於小龍坎半山上的半畝園，附近有橘樹林，風景優美。兩家寓所僅一條公路之隔，故過從更密。」¹「民國十五年秋，郭受羅先生的指示，開始纂輯《太平天國大事日誌》，備作治近代中國史者的工具。……《太平天國大事日誌》，後改名《史事日誌》，於二十九年亦由商務出版，由羅先生寫了一篇短序，略論太平天國的歷史，由於文獻的毀滅與禁忌，遂成為恐怖的象徵，或神秘的淵藪，充滿了『神秘的』與『浪漫的』色彩，而從客觀的史實，以嚴整的史學方法，來研究這一代成敗興亡的人很少。他讚美這部書是意外的收穫。並稱：『要寫太平天國史，必先把太平天國的史實，用比較的方法，考訂其準確性；再按其時間的順序，列舉下來；以時間來統帥錯綜複雜的事實，俾使發現其因果或前置 (Antecedent) 與後隨 (Consequence) 的關係，然後始可著筆。』這是羅先生研究近代史的原則，也是郭所實踐的方法。羅本來答應為郭的這部書寫一『長篇導言』，把他對於太平天國一代興亡的觀察，詳細的寫出來，這將是綜合的、鳥瞰的、綜觀會通的工作，可惜處於『火光彈聲』之中，竟不能著手。郭亦在本書『凡例』第二十條中特別說明：『本書之作，羅志希先生實予以極大之指導與助力。即《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一名，亦為羅先生所擬定。』²羅家倫對郭廷以的這項成果激賞不已，他在序言說，「這部二千四百餘頁的巨製」，「截至現在止，研究太平天國的第一部大書，是將來寫太平天國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據書」。³羅氏在日記中對此表示「余心至慰」，深愧自己無法完成。郭廷以後來的《中國近代史》第一冊，一九三九年完成，以

1 王聿均：《羅志希先生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〇九—九一〇頁。

2 王聿均：《羅志希先生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一〇—九一一頁。

3 李雲漢：《羅志希先生的新史學觀》，臺灣，《近代中國》之「羅家倫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專輯」，第九十四頁。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增訂稿為「引論」。初版「例言」稱：「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間。羅志希先生已詳論之。……編者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太多。」¹羅氏和郭氏之間這種理念和實踐的合作，當真珠聯璧合。

待羅氏執掌清華時，為按照他的現代化理念打造清華歷史系，他不惜得罪資歷最老，又是他師長輩的朱希祖，一定要聘請蔣廷黻來清華歷史系任系主任。他說：「若是我讓朱先生擔任系主任的話，那朱先生因為是中國史學專家，對於世界史學的潮流沒有接觸，自然無法使這個系走到現代化的路上。這是我請蔣廷黻的理由。」²

一九三一年，離開清華到武漢大學任教的羅家倫再一次重拾近代史研究之夢。他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研究文化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的文章，「正式揭櫫探求近代中國歷史的原則和方法」。在這一篇長文裡，羅氏非但深刻地討論研治近代史的意義，而且還明示了今後研究的相關問題與方向。羅的此文有著對近代中國史研究上的自許和體認，也具備了里程碑象徵意義的文獻。羅家倫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三項極待克服的困難：「首先，史學界一直以來都存有歷史古董化的心態；其次，研究近代最艱巨的難處，勢將面臨資料無法公開的問題；最後則是難以避免個人好惡，無法達到客觀標準。」³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羅氏經過深入的

1 王聿均：《羅志希先生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一一頁。

2 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文存》第八冊，回憶，第四〇三頁。

3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轉引自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

思考，放棄了他當初想寫一部《中國通史》的宏願。他認為現在想要動手寫一部中國近代史，其實還不到時候。如果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倡議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不可：「史料叢書的編訂，實在是基本的工作，而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將所有的史料一齊發表，固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將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輯排比』或是『參互搜討』的功夫，實在是新史學的基本建設。」¹而羅氏心目中的「新史學」以及這種新史學的研究方法，就在這種編訂史料叢書的工作中得以體現。羅氏因而特別強調近代是中國近三千年未有的大變，中國近代歷史與世界歷史的「交互性」已經無可否認、不可漠視，要明瞭近代中國的特色，必須懂得掌握中西雙方的史料：「中國確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許多國際關係，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影響」，「現在沒有幾件中國的事實，是可以離開世界的環境講得通的」。²「不知道他國材料，或是不能運用他國材料而寫中國近代史，則一定使他的著作，發生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³此外，他認為要成為科學的史學，必須經過專題（Monograph）研究的階段，因此提倡專題或分題研究的重要性。他又重視「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他舉出章實齋修永清縣志，「親詢鄉婦委曲」，證明許多實際的情形，是要靠當代人口述的。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記載，是他從埃及等處親自見聞得來的。突西底德斯（Thucydides）是親自參與伯羅奔尼撒戰役（Peloponnesian War）的人，所寫的戰史也是親知的，是一部「很可靠

《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1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轉引自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

《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2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轉引自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
《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而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著作」。¹羅氏文存中存有諸多翔實生動的回憶文章，在前面章節中多有引用，正是羅氏對自己親歷之事的「口述歷史」。

羅家倫這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使他被推崇為「倡導有計劃的研究中國近代史之第一人」。而也在這期間，羅氏唯一一部史學方面的研究專著《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對於此書的撰述動機及經過，他在該書序言中說：「在一般民族文化發展而歷史和傳記受相當科學化的國家裡，凡是偉大人物的生平，無論是大事小事，都有精細確切的考訂。對於思想家、文學家、發明家、軍事家……莫不如此，對於開國的人物和民族的領袖，更不消說。何況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全部民族史上的地位，和倫敦蒙難這件事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及當時國際輿論的關係？但是中山先生倫敦蒙難這件事，除了他自己所著的英文《倫敦被難記》而外（原名為『Kidnapped in London』），絕無其他一點史的研究。民國十七、十八這兩年，我和維楨為了中國近代史裡面專題的研究，得著機會盡量調閱以前總理衙門的檔案。有一天下午，我為研究中日戰爭到他結束後的餘波，忽在一八九六年的密電檔內發現一個電報，關於中山先生倫敦蒙難這件事的。於是動了研究的興趣，我們兩個人費了許多時間，搜盡密電密啟的檔案，居然得到二十八通文件，認為是很有趣而很寶貴的材料，於是把他們一齊抄下來。……十九年夏間在南京和吳稚暉先生談到這個問題，承他借我一部吳宗濂的《隨軺筆記》四種，在這裡面看見幾篇他處不曾見到的文件。後來在上海又承胡適之先生送我一部鳳凌的《遊餘僅志》，裡面記得有關於中山先生倫敦蒙難的事情。我又把康德

1 王聿均：《羅志希先生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〇七頁。

黎的記載一翻，於是動了把這些材料連貫起來發表的興趣。本來只預備成一短文，不料動筆後寫得太多了。方才寫完，即問王亮疇先生借他從倫敦購回中山先生親筆寫的兩張名片去照相，因為這是在使館禁閉室寫出來向康德黎求救的。哪知道和亮疇先生一談，這問題的範圍又擴大了。他對於這個問題，也很有興趣，所以去年他在倫敦的時候，不但設法買到這兩個名片，並且教人將倫敦中國使館裡所有關於中山先生蒙難的檔案，連英文的偵察報告，一齊抄來。他並且交給我，讓我使用，這是極可感謝的事。這種檔案裡的文件，雖然有幾種是與我們在總理衙門所抄的相同（相同的當然可以互相校正），但是，不同的也有。當然總理衙門的檔案，也有是倫敦中國使館所不能有的。兩面合起來，再加上其他私人的記載，對於這件公案的文獻，也就差不多完備了。因為這種種的幫助和鼓勵，我不能不把全文改造一次，索性印成一本小書，供史學家的參考。」¹這一專著，正是羅家倫史學觀念的一種展現。

抗戰時期，羅家倫發表了著名的《新人生觀》，戰勝利後，又出版了《新民族觀》，在羅氏的思想構架中，《新民族觀》是繼《新人生觀》系列而寫的，將人生問題擴大到民族問題，而他還打算日後要接下去寫一部《新歷史觀》，來縱論歷史的演化和人類的前途，以完成他擴展的思想系統。只可惜後來，羅家倫所設想的這部《新歷史觀》始終未能成書。

但自北伐羅氏加入政黨工作以來，差不多已經定下了羅氏和為學之途的分際。退守臺灣之後，他出任國民黨史官。他在黨史會主任委員任上，就史料匯集和編纂來說，終於重拾近代史研究的舊

1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九四—九五頁。

夢。「儘管羅先生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困難的克服，持以樂觀的看法，但他對於中國近代史料文獻的喪失之快，極感痛心」¹。所以，對史料尋訪、搜集、整理、考訂、發表，一直是羅家倫最重視的工作。羅久芳也說父親的工作是提倡現代化的保管和處理史料方法，並且有系統地編印多種原始資料，為治史艱巨的工作鋪路。

在羅氏任中，黨史會進行的文獻編輯和整理有：《國父全集》、《國父批牘墨跡》、《國父墨跡》、《國父年譜》、《國父年譜初稿》、《革命文獻》、《開國名人墨跡》、《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等。但這些工作，或許足讓人認可他為一名史官，而很難說他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而最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儘管早年秉持學術獨立的原則，羅家倫指稱要寫一部科學的歷史，非有『三不主義』——不理論化、不道德化、不國家化——不可。可是長期以來，羅家倫加入中國國民黨行列，便以『國民革命』觀點來詮釋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依照羅在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發言，認為中國近代史如果自鴉片戰爭算起，歷經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國際性戰役；國內革命則有太平天國、辛亥革命，這些引發而來各式各樣改革，『雖曰屈服，然尚有刷新之思』。而如今只有國民革命作為號召，努力準備未來。」這種史觀，自然逃不了「黨化教育」之譏，更不用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羅氏的國民革命史觀成了大陸馬列主義史學批判的矛頭所向。² 羅氏於史學的貢獻自有其價值，而其局限亦甚明也。

1 蔣永敬：《羅志希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臺灣，《羅家倫傳記資料》。

2 參見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臺灣，《思與言》，第四十二卷，第四期。